

大刀雄兵殲敵：

宋哲元與二十九軍

陳嘉驥

民國十九年，馮玉祥、閻錫山反抗中央。中

原大戰之役結束，馮玉祥殘部多渡黃河進入山西省南部，中央命張學良負責改編並予統轄；張學良遂將這些馮系部隊縮編為一個軍另兩個師。這一個軍稱為第三軍，軍長為宋哲元，三個師長分別為張自忠、馮治安、劉汝明，另外兩個師則為龐炳勳與孫殿英。

宋哲元的第三軍番號，係按張學良東北邊防軍的次序排列，至民國二十年六月，中央着手整編全國陸軍，第三軍遂改稱為二十九軍。此時中央本擬調廿九軍與前歸順中央亦屬馮系的孫連仲部隊，均到江西協同中央部隊實施剿赤工作，嗣九一八事變爆發，二十九軍南調計劃遂作罷。

日本於東北三省得手後，侵略目標乃指向熱河及基城沿線，中央有意調宋哲元率部進駐熱河，因未得張學良同意，乃於二十一年九月命其北上進駐察哈爾，並發表宋哲元為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宋哲元部隊甫行抵達察哈爾，駐防未定，日本軍隊即於民國二十二年元旦開始向山海關進攻，不數日即將山海關攻陷，全國為之震動。蔣委員長除派第二師黃杰及第二十五師關麟徵率部北上增援外，並制定「確保冀熱鞏固平津」的作戰計劃，將北方各軍及中央增援部隊，編組為八個

軍團。這八個軍團編組的情形如左：

第一軍團，由于學忠的五十一軍與龐炳勳（原編為師後又擴為軍）的四十軍組成，于學忠擔任總指揮。

第二軍團，由商震的三十二軍與王以哲的五十七軍組成，商震擔任總指揮。

第三軍團，由宋哲元的二十九軍組成，宋哲元擔任總指揮。

第四軍團，由萬福麟的五十三軍組成，萬福麟擔任總指揮。

第五軍團，由湯玉麟的五十五軍組成，湯玉麟擔任總指揮。

第六軍團，由孫殿英的四十一軍組成，孫殿英擔任總指揮。

第七軍團，由傅作義的三十五軍與李服膺的五十九軍組成，傅作義擔任總指揮。

第八軍團，由何柱國的六十七軍與中央第二師、第二十五師組成，楊杰擔任總指揮。

喜峯口外殲敵奇兵

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廿七日，日軍分三路向熱河進攻，湯玉麟的五十五軍與日軍甫行接觸即行潰退。蓋日軍砲兵先行對五十五軍施行砲擊，使

對方部隊連頭都抬不起來，更遑論作戰？當打得對方凌亂不堪已無作戰能力時，日本步兵始在裝甲部隊掩護下向前進攻，五十五軍即行潰敗而不可收拾。此時坐鎮承德的湯玉麟，雖在中央行政院代理院長宋子文勞軍時，曾誓言：「玉麟為桑梓，為國家，決矢志守土」，但眼見所部潰不成軍，乃於三月三日棄承德潛逃，四百名日軍騎兵，遂不戰於三月四日佔領承德，熱河乃告淪陷。

熱河既失，日軍鋒銳長驅直入，並逼近長城沿線，平津岌岌可危，蔣委員乃匆匆北上至保定，倘長城之線再失利，準備在平津背城一戰，同時明令通緝湯玉麟。張學良亦因戰事一再失利，致電國民政府，引咎辭職，中央乃派何應欽北上代理北平軍分會委員長職，張學良乃南去上海，先戒毒癮，嗣即出國考察。

日本自發動瀋陽事變，不旋踵間即將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置於掌握中。其間除了在黑龍江的嫩江橋畔，遭逢馬占山的抵抗外，可以說等於兵不血刃，現在又輕易的佔領熱河，正在意滿志得，視中國軍隊為無物，並認長城各口將垂手可得。此時宋哲元率二十九軍，奉命援防喜峯口，但三月九日到達喜峯口時，日軍已將口外高地佔領。

宋哲元除命二十九軍正面設防，誓死不退外，並趁黑夜派趙登禹旅長率部繞攻敵後，以大刀奇襲敵陣，一陣廝殺，日軍多身首異處，經三晝夜之血戰，斃敵逾三千以上，爲九一八以來中國軍隊首次重大勝利。其間劉汝明部在羅文峪，與日軍遭遇，復發生肉搏戰，中國軍隊身疲力大，使用大刀與身材矮小使用刺刀日軍殺來殺去，又獲勝利，從此二十九軍大刀隊之名遠播中外；與嫩江橋畔的馬占山部隊，淞滬抗戰的十九路軍，同爲家喻戶曉的抗日英雄了。

日軍遭此挫敗，遂不敢再輕視中國軍隊，並嚴加戒備，作戰時先行加強砲火攻擊，長城沿線我國軍隊均有嚴重損失，平津勢將難保。嗣日皇裕仁在第一次日軍作戰檢討會議中，看到日本陸軍省所繪「北支作戰形勢圖」中，得知日軍已逼近中國昔日京畿的堂奧之區時。他認爲日本侵華應採逐步蠶食政策，不應釀成中國全面抗戰之局，俾免其國內工商業受到影響，同時亦可不受國際間輿論的制裁。因此，傳出願與中國達成局部停戰協議風聲；中國中央政府乃派黃郛北上，與日軍締結塘沽協定。日軍退到長城沿線，業經其佔領的冀東廿四縣組成一特別行政區，由中國派親日派股汝耕爲行政督察專員。不久，股汝耕在日軍支持下，宣佈自治脫離中國中央政府，成立冀東自治偽政府。

宋哲元率廿九軍返回察哈爾前，馮玉祥曾至張家口組織抗日救國軍，企圖在中央政府範圍外另成軍事系統，意在東山再起。幸宋哲元深明大義，以消極態度對付，使馮玉祥知難而退。

日寇蠶食華北行動

股汝耕成立冀東自治偽政府後，冀東二十四縣可以說又被日軍搶奪而去，於是日人立即開始蠶食平津與華北的行動，其居心狠毒，不給中國喘氣機會，時至五十年後今日，猶令人憤恨不已。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岡田首相在其內閣會議中，通過對支政策，主張不容許北支中央化，利用親日份子，取代目前華北負責官員，使華北成爲「日滿支親善區域」。岡田政府這項政策，遂成爲日本關東軍與日本華北駐屯軍，作爲進一步侵略中國華北的政策依據，並逐步展開行動。這時支撐華北危局者爲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黃郛、河北省主席于學忠、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等人。黃郛曾致電宋哲元云：「人民無知，多抱激越情緒；敵國不仁，何來無厭之求；政府不勇，多取迴避態度；吾人夾存其間，欲謀救國，實苦無途徑可循。」

民國廿四年五月，日人藉口親日報人白逾桓、胡恩溥之被刺殺，與抗日游擊隊進入冀東停戰區，要求中央軍、國民黨張學良勢力退出河北省地區。中國政府迫不得已，乃採取措施，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學忠免職改調陝甘剿匪，商震繼任河北省主席，任命宋哲元爲平津衛戍司令，黃杰與關麟徵部隊南調，停止國民黨在平津及河北省一切活動，並將華北政務整理會撤消。

日人當時能容忍喜峯口抗日英雄宋哲元在華北，蓋認爲宋乃馮系大將，可以利用爲反中央勢力。果不然宋哲元於九月二十日就任平津衛戍司令未數日，日人即要求宋哲元組織自治政府，由日本軍經援助，立爲宋所拒絕。這時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分散一本「對華基礎觀念」小冊，上載：「只要蔣介石及其一黨統治中國，即使日本採取公平合理的政策，他們也不會對日友好。因此，日本帝國應獨斷獨行，不理他們虛與委蛇，在日華之間建立一共存共榮的樂園，以遂行帝國對華政策。這個樂園將逐漸擴張，迫使中國從根本上改變對日態度，否則蔣及其一黨不可能被允許存在」。日本外相廣田宏毅於十月四日，提出滅亡中國的三原則，這三原則爲：承認滿洲國、共同防共、中日經濟提携，更促進了當年的華北危機的嚴重性。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立即要求宋哲元採取下列兩項措施：其一，通電成立華北自治政府，將南京政府任命的華北官員一律罷免。其二，修改天津海關稅則，以利日貨進口，建築滄州石家莊鐵路，便於日本對華北經濟開發。土肥原的要求，仍被宋哲元拒絕，但在社會上謠傳宋已與日本妥協，宋哲元乃於十月十九日在北平接見新聞記者，發表談話稱：「余就職後，即本中央陸鄰令，努力進行，在不侵犯平等的原則下與日本交涉，決無文字上或口頭上任何秘密條件，外傳種種均係謠言，而不足聽。余在張垣時即有『不說騙人話，不做騙人事』之主張，而社會上尤應舉誠存真，提倡正氣，一切方有希望。」宋哲元此項談話後，有識者即認爲他決不會賣國求辱了。

情勢危迫民情激憤

日本企圖不戰而攫取華北陰謀，當然不肯就此罷休，乃採威嚇手段，要求撤消北平軍分會，並以九架飛機編隊低飛穿越北平市上空，當飛抵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辦公的中南海上空時，並降低高度加大噪音，整個北平市均為之震撼。北平市民此時均有憤憤不平之色，筆者是時正在北平崇德中學操場上，體育蘇老師以凝重的表情說：「孩子們努力吧！不要作亡國奴啊！」

中央政府爲了不使華北危機，立刻演變爲正式戰爭，乃將華北人專局部改組，秦德純取代袁良爲北平市長，蕭振瀛爲天津市長，張自忠爲察哈爾政府主席。中央並密令宋哲元，在範圍允許情形下，應儘量與日本虛與委蛇，以爭取時間，充實國防，以備來日舉國一致的抗戰。蔣委員長並在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於十一月十九日公開宣示對日方針：「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行政院並於十一月二十六日舉行院會，決定：(一)撤消北平軍分會，改派何應欽爲行政院駐北平長官，(二)派宋哲元爲冀察綏綏主任，(三)下令通緝漢奸殷汝耕，(四)命令駐日大使館參事丁紹伋向日抗議天津日本駐屯軍蔑視中國主權言行速爲有效制止。

日本軍政當局對我國的強硬態度極爲不滿，訓令駐華日軍，繼續推動華北自治運動。(按世人每將日人侵略諉諸日本軍閥，實自日本裕仁起皆爲侵華罪犯)。土肥原乃再度促宋哲元在十一月三十日前，表明態度宣佈華北自治。宋哲元爲與日本虛與委蛇，乃與秦德純分別電蔣委員長，

報告北方危急情況，並故意用曖昧措詞請求中央早決大計，電文曰：「憂思疊乘，情勢危迫。屢經電陳，計邀鈞察。刻下民情愈益憤昂，城鄉市鎮，議論紛紜。倡導自治者有之，主張自決者有之，一一阻遏，既有所不能，空言支撐，亦絕非言語所能奏效。哲元薄德能鮮，撫馭無方。綜衡情勢，似非因勢利誘，別有以慰民望定民心之有效辦法，縱外患不計，亦內憂堪虞。哲元職司效士，見聞較詳，心所謂危，不敢不告。謹電披陳，不勝悚惶待命之至。」

中央乃派在南京開會之何應欽赴北平上，宋哲元乃向抵達北平之何應欽報告與日交涉經過，強調三點：(一)聽命中央，(二)不向外人屈服，(三)與日人無任何秘密協定。日人並對何應欽施加壓力，堅決反對他留在北平，從速允許華北組織親日的自治政府，否則日本將採斷然措施。這時華北教育界於十二月二日通電反對自治，鄭重聲明華北民衆無意脫離中央；同時北平各大、中、小學學生展開愛國反偽的自治運動，要求中央派大軍北上抗日。

日本處於此種情勢下，始同意中國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人選由中國政府決定，以適合北方環境爲標準，中央乃派宋哲元任委員長。同時中國中央政府並聲明，一切軍事、外交、政治、經濟措施，均不能越出中央法令，絕對不可用自治名目。北平市大、中、小學學生，仍堅決反對冀察政委會成立，發動「二一、九」及「二二、一六」愛國遊行示威。其間當時執我國輿論權威的大公報，刊出社論，指責宋哲元「甘爲國土

分裂者。」冀察政委會於民國廿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成立，宋哲元就任委員長並兼河北省政府主席，但不久就由馮治安接任。這時冀察重要人事爲，宋哲元爲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秦德純爲北平市長，馮治安爲河北省政府主席，蕭振瀛任天津市長不久改由張自忠接任，張自忠任察哈爾省主席不久由劉汝明接任。

宋哲元謀略戰制勝

宋哲元主持華北政務後，使日本千方百計分割中國領土計劃，在表面上達到了部份願望，但不久日本人即發現完全是一場空；外人均認爲這是中國對付日本謀略戰的勝利。大公報亦對宋哲元之指責與批評表示歉意，並對宋以停郵處分大公報出以受之而無怨的態度，不久宋亦取消對大公報的處分。胡適並發表談話說：「二十九軍的領袖諸君對國家的忠心，是不須我們疑慮的。他們兩年前在喜峯口作戰時，曾有八千健兒爲祖國流過血，一個有着這樣悲壯光榮歷史的軍隊，是不會辜負國家的付託與人民期望的。」

冀察政務委員會中及其設置各委員會中，當然免不了有若干的親日份子，如當時主管交通委員會並任北寧鐵路局長的陳覺生，母爲日人曾被認爲係百分之百的漢奸。其後國人始明瞭他因與老報人龔德柏爲同學，由龔德柏介紹而加入了王芃生主持的我國國際情報研究組織，供給了我國許多日軍集結的情報，後爲日軍殺害。

民國廿五年這一年，宋哲元與日本交涉中，雙方均圖謀有所進步，日方要求宋哲元逐漸完全

脫離中央，成爲日本傀儡；宋哲元則在保持現況下，要求日本能取消冀東自治政府。日本曾一度表示冀東僑自治政府可以取消，但要求冀察政委會冀東化然後合流，換句話說就是把冀察兩省全變成冀東的傀儡型態。經過廿五年這一年的交涉，日本始明瞭廿九軍各將領不是漢奸，也不可能在日本威逼利誘下成爲漢奸；遂喊出冀察逐漸中央化，以及廿九軍抗日熱等說詞，準備用武力拿下平津，然後再向華北逐步擴展。

第廿九軍招兵買馬

宋哲元的廿九軍這時也大肆招兵買馬，人高馬大的河北省農村子弟，體認到中日戰爭的最後不可避免，紛紛均投效廿九軍。有人說在民國廿五年年尾，廿九軍已擴充到有二十萬人之衆。但由於七七事變後，宋哲元的幾個師長馮治安、張自忠、劉汝明等均擴充爲一個軍的專責，廿九軍有十餘萬衆是不成問題的。這時的廿九軍士兵，身着灰色軍服，幾乎每個人身高均在一七〇公分以上，除了身揹一枝步槍外，並在後背斜插着一把大刀，刀靶處繫着一塊紅綢或綠綢，真是威風凜凜。

日人經過多種方式，企圖壓迫宋哲元疏離中央政府皆無效後，於是由裕仁親自上令，擴大日本駐天津部隊的員額與編制，對驅逐宋哲元於河北省之外預作準備。由日人收買的天津庸報，不斷刊載廿九軍準備抗日消息，該報說：「廿九軍自宋哲元以下，均患有抗日熱不正確思想，正積極招兵買馬進行對抗日本皇軍的準備。宋哲元

擬以北平天津爲抗日第一線，保定爲抗日第二線，石家莊爲抗日第三線，並已獲得中央軍必要時援助的保證」等。

日軍增加駐屯軍員額後，遂着眼北平天津間戰略要地豐臺的佔領，故意製造豐臺事件，迫廿九軍退出豐臺。日軍並爲了迫廿九軍全面屈服，於民國廿五年十月廿六日至十一月四日舉行秋季大演習，坦克車在北平和平門等地通過，進入市區內，街道柏油路面均爲之破壞。廿九軍在日軍演習時，除了在北平城門加派警衛力量，並在日軍經過街道派便衣軍警，以備不測外，同時在十一月十一日開始，也舉行了三天大演習。

全面抗戰日寇途窮

廿九軍與日軍在平津的衝突，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河北省政府主席馮治安，在一次宴請北平中學校長敬師時，曾暗示局勢險惡與廿九軍決不向敵人低頭的決心。其後綏遠百靈廟戰役爆發，日人與東蒙匪軍混雜在一起的王英部隊，遭國軍傅作義卅五軍與中央軍湯恩伯、門炳岳等部隊一舉擊敗，對廿九軍士氣有莫大鼓勵。不久西安事變發生，蔣委員長被東北軍劫持，但張學良隨即悔過，恭送蔣委員長返京，全國民心士氣受此刺激更形團結。此時國人在蔣委員長領導下，一致抗日形勢已成，廿九軍在舉國民心士氣激昂情形影響下，對救亡圖存的抗戰更是躍躍欲試，不勝企盼了。

北平自民國廿五年，就流傳世界大戰即將爆發謠言；到了民國廿六年，筆者在學校放暑假即

將返里前，又盛傳日本即將進攻華北，中日戰爭將於暑假中開始。果不然，筆者返里未數日，即傳來七月七日廿九軍在蘆溝橋與進攻的日本軍隊發生衝突消息，全中國響起犧牲已到最後關頭呼聲，到處都在準備抗戰。

回想當年戰爭未爆發，社會間就流傳出中日大戰將行爆發傳言，並且果然獲得證實原因，迄今仍是迷團莫解。最近閱覽老報人龔德柏傳記中，始明瞭係當年冀察政務委員會交通委員會主任委員，兼北寧鐵路局長陳覺生向龔德柏透露，龔又向宋哲元、秦德純報告。陳覺生因管華北交通，知道日本兵力向華北集中，以及戰爭物資儲備繁忙，已預料到日本軍必將肇禍，否則日本何必這樣忙碌？同時日本在華北挑釁行動，已脫離正常範圍以外；因爲根據辛丑條約，日本軍只能在自北平到山海關的北寧鐵路沿線駐軍。而這時日軍遠離北寧路以外，到中國腹地各縣份行動，並且擅自購買農田要在北平南郊建立飛機場，嗣遭部份農民拒絕無法取得用地始未果。最後日本軍行動，竟然到了平漢鐵路上北平與南方交通的咽喉的蘆溝橋，其意在挑起戰爭已非常明顯。

日本企圖佔領蘆溝橋，控制北平與保定交通要點的平津鐵路上宛平縣目的，係擬藉此一舉佔領平津。然後與中國局部妥協，在冀察建立完全聽日本話的傀儡政府，一俟這個傀儡政府穩固後，再發動另一次事變，再擴大其控制地區，一步接一步的發展下去，最後不經過重大戰爭而完全佔領中國。日本此項蠶食中國計劃，倘任由其一步一步做下去，大概不須二十年，整個中國便完

全入於其掌握中，那麼中華民族真的萬劫不復了。

蔣委員長已窺破日軍此項蠶食圖謀，遂下定決心，以北平天津確保與否為中國開始抗戰的最後關頭，絕不容許日本的逐步蠶食。七七事變後，日本近衛首相，表面上發表了「北支事變日本決採不擴大方針」聲明，但在暗地增派了好幾個師團，陸續向北平天津地區集中。其陣地工事武裝設備等早在多日前已經經營妥當，兵力一到立於七月廿八日，一舉奪下平津。日本原期佔平津目的已達，等待中國屈服，展開談判組織親日傀儡政府。但蔣委員長却於八月十三日在上海開關另一戰場，除使日本陷入長期戰爭外，並使中日戰爭，由日本自北方居高臨下優勢戰爭，變成日本自東仰攻西上的逆勢戰爭。

平津失陷後，宋哲元的廿九軍在南苑保衛戰中，遭到嚴重的損失，副軍長佟麟閣，一二三師師長趙登禹亦於此役中殉職。

將士用命與敵偕亡

宋哲元於平津淪陷前晝夜前往保定，北平天津暫委託天津市長張自忠肆應，嗣張自忠在前西北軍軍需處長王毓俊（王毓俊現在臺）等八人策劃陪同下，逃離天津到南京，向蔣委員長報告。

這時中央將廿九軍擴充為第一集團軍，下轄三個軍，計七十七軍軍長馮治安，五十九軍軍長張自忠，六十八軍軍長劉汝明，宋哲元則任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個軍除了七十七軍代表紀念蘆溝橋七七事變外，其他五十九軍與六十八軍，亦暗含着由兩個七七的數字所組成，

五和九與六和八加起來，均為兩個七，而為一十四也。

宋哲元在華北，負責軍政與外交鉅任，與日人週旋數年，使中央政府得以數年喘息對抗作了若干重要準備措施，本已心力交瘁；七七抗戰，指揮第一集團軍，在平漢鐵路上的琉璃河、徐水、保定、石家莊、元氏、邢臺、邯鄲等戰役中，在前線親冒砲火指揮作戰，體力透支過甚，乃病倒不支，經多日休養仍不見好轉，遂於民國二十七年辭去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及第一集團軍總司令等軍職。宋辭職後，仍保有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及軍事委員會委員職務，於是追隨政府到四川養病，其間病況一度好轉，但民國二十九年病勢忽又轉趨嚴重，遂於是年四月在四川綿陽縣逝世。第一集團軍及所屬的七七軍、五九軍、六八軍，自平漢路退守黃河南岸地區後，不久改編為卅三集團軍，由張自忠任總司令仍兼五九軍軍長，馮治安則升任副總司令兼七七軍軍長，這兩個軍於武漢撤退後，駐守平漢路南部的西部山區，隨縣、應城、棗陽、襄陽等地區。劉汝明的六十八軍，在武漢保衛戰中，曾在鄂東的濟水、英山、羅田等地奮戰。

民國廿九年，日軍侵略隨縣、棗陽等地，張自忠率卅三集團軍奮戰迎敵，予日軍以嚴重損傷，但張自忠本人因身陷重圍，抱定不成功即成仁決心，壯烈殉國。張自忠殉國消息傳到陪都重慶，蔣委員長深為哀悼，立即追贈張自忠為一級上將，並明令隨縣改為自忠縣。來臺後，蔣委員長對張自忠殉國仍念念不忘，曾指示有關方面為之

舉行張自忠上將殉國十周年紀念，殉國二十周年紀念，以及殉國三十周年紀念。張自忠逝世後，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乃由副總司令馮治安升任，仍維持着廿九軍的傳統精神於不墜，但劉汝明的六十八軍却仍轉戰其他戰區，故三十三集團軍實際僅指揮兩個軍而已。

兩個赤蛋污染軍譽

馮治安為人誠厚治軍較寬，遂為共黨份子何基澧與張克俠所蒙蔽。何基澧係於抗戰後的民國二十八年，始誤墜共黨術中，而張克俠早在西北軍時代即加入共產黨。在冀察政委會時代，馮治安任三十七師師長時，何基澧為三十七師的旅長，馮治安任七十七軍軍長後，何基澧亦升任為七十七軍副軍長，迨馮治安任第三級靖區司令官後，何基澧曾接任七十七年軍軍長旋升任副司令官。張克俠在七七蘆溝橋事變前，已任廿九軍副參謀長，嗣廿九軍改編為第一集團軍，張克俠改任參謀。第一集團軍改組為三十三集團軍後，曾任參謀長、副總司令及第三級靖區副司令官。

廿九軍擴編為七十七軍、五十九軍、六十八軍後，六十八軍軍長一職始終由劉汝明擔任。七十七軍軍長一職，則歷經三人，其次序為馮治安、何基澧、王長海。五十九軍軍長一職亦先後經歷三人，這三人是張自忠、黃維綱、劉振三。何基澧與張克俠雖早為共黨份子，但張克俠隱蔽得法，在三十八年以前，始終未為人發現；何基澧在民國廿九年任七十七軍的一七九師師長時，曾為第五戰區諜報組偵破其為共黨份子，曾被調到重

慶受訓。受訓後西北軍舊人向當局力保，蔣委員長以當時日寇深入國內腹地，外患方殷，彼既宣誓悔悟，乃予寬大處理，允其返三十三集團軍服務，並信任如故仍踞高位。

冀魯健兒忠貞不二

民國三十七年以後，政府戡亂軍事節節失利，首先於九月廿五日濟南因吳化文叛變而失陷，啓開國軍堅守中大城市亦被攻陷的先例。繼而東北國軍在錦州保衛戰中失利，錦州於十月十九日淪陷，由瀋陽出援錦州的三十萬大軍，又在半途遭連伏擊而全軍潰滅。在瀋陽軍政人員，遠聞三十萬大軍覆滅，驚慌失措，衛立愷於十月廿八日率文武官員逃走，瀋陽於十一月二日始告失陷。同時，被嚴密包圍多月的長春軍民，飢餓難捱有的以人爲食，最後死亡枕藉，新七軍因六十軍內部變化而無法繼續堅守長春，在瀋陽失守前，即十月廿三日也告淪陷。

政府於東北三大據點相繼失守後，即行集中掌握中的精銳部隊，計有邱清泉、李彌、黃百韜、孫元良四大兵團爲主力，再配合第三綏靖區馮治安部隊，亦即前廿九軍改編的七十七軍與五十九軍等，在徐州外圍佈置「十」字形陣地，與匪進行決戰。並派老將劉峙爲徐州剿匪總司令，杜聿明爲副總司令並負責前線指揮事宜，對外號稱總兵力百萬，實際上有超過七十萬的兵力。最高當局，對徐州決戰佈置相當妥善，倘無意外雖不能全勝，亦不致有大的差錯，最壞形勢亦可逐步撤退至長江沿岸，鞏衛首都安全決不成問題。

這時戡守徐州前線的五十九軍與七十七軍，

受何基濤與張克俠的蠱惑，已有不穩情勢，但馮治安在徐州却被蒙蔽中而毫不知情。嗣杜聿明得知情報派某將領前往安撫，詎料該將領甫行返回徐州途中，七十七軍與五十九軍即在何基濤與張克俠領導下，於卅七年十一月九日脫離陣地，公開叛變。這時第三綏靖區司令官馮治安在徐州，七十七軍軍長王長海亦適自前線至徐州，向馮治安報告前線部署情形，五十九軍軍長劉振三也正因病在南京就醫，猝然間發生叛變，因而無法挽救，致使徐州戰場整個佈置弄得面目全非，漏洞百出。杜聿明臨時增調部隊，填補漏洞，致使黃百韜防區發生空隙，被圍於碾莊，黃百韜彈盡援絕全軍盡墨，乃自殺殉國。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徐州戰場立陷於四面受困之境，南撤路線又乘直線而採迂迴曲折繞道而行，致行動緩慢處處受到截攔。自華中戰場來援的黃維兵團，未得桂系掌握的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全力支援，復被圍於雙堆集，徐州兵團解圍無望，又加氣候惡劣雨雪交加，真是天亡我也。

何基濤與張克俠之叛變，在政府傾全力舉行總決戰之際，其對國家影響之重大，誠無可比擬。但是廿九軍畢竟是有歷史之部隊，七十七軍僅有一半不明真相，被裹脅而去，另有一半人仍對國家表示忠誠，乃因軍長王長海率領投向邱清泉兵團繼續作戰。嗣被裹脅部隊，在明瞭真相後，相與痛哭流涕，復有數千人突圍回歸；中央乃任命在蘆溝橋首先抗日的吉星文團長（時任七十七軍師長），接任七十七軍長，在南京收容整編。

爲國捐軀壯烈感人

三十八年大陸局勢益不可爲，廿九軍系統下，僅劉汝明的六十八軍（劉亦任綏靖區司令官），在危疑震盪中，逐步南撤抵達廈門，並抵達臺灣。廿九軍重要領導人，除宋哲於民國廿九年病逝四川，張自忠在湖北殉國外，餘如秦德純、馮治安、劉汝明、劉振三、王長海、吉星文、劉汝珍等均對政府忠貞不二，撤退來臺。三十餘年來，秦德純、馮治安、劉汝明等已行物故，吉星文則在金門防衛副司令官任內於民國四十七年殉國。

七七事變前兩年，宋哲元與廿九軍，爲國家負守衛北疆的責任，支撐華北危局，與敵人虛與委蛇，而事事暗中服從中央命令，不避怨謗，爲國家保存了冀察兩省與平津兩大都市的主權，也爲政府爭取了兩年備戰的時間。

在抗日期間，二十九軍這支以冀魯健兒爲主訓練優良的部隊，在平漢負主要抗戰工作，犧牲重大。蔣委員長特別將廿九軍擴編爲七十七、五十九、六十八共三個軍。尤其在民國廿九年，張自忠率廿九軍部隊在平漢路兩側湖北省境內，重創日軍並以身殉，尤爲壯烈感人。

在徐州會戰中，何基濤與張克俠之叛變，誠爲國家之不幸，亦爲廿九軍之不幸。但一、二叛逆自不能掩蓋廿九軍將領修麟閣、趙登禹、張自忠、吉星文等人爲國捐軀；以及宋哲元、秦德純、馮治安、劉汝明、劉振三、王長海等人的克盡忠勤也！